

# 试析共产国际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

王 涛

[内容提要]共产国际的成立,标志着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开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作为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组成部分,不可能脱离共产国际的指导。共产国际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指导了中国妇女运动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促进了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但是,由于脱离中国现实以及受苏俄的大党、大国主义影响,共产国际的干预也给中国的妇女运动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

[关键词]共产国际 中国妇女运动 影响

[分类号]D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6505(2012)01-0064-05

要理解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对中国妇女运动的指导作用,首先要正确认识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以及共产主义组织与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的章程规定:共产国际是“无产阶级的统一的、集中的国际性政党”<sup>①</sup>,“在各国进行工作的党只是它的独立支部而已”<sup>②</sup>,因此共产国际“几乎必须干涉每个党的事务”(季诺维也夫语)。对这项规定,中国共产党表示接受,中共“一大”提出“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中共“二大”宣布“中国共产党为国际共产党之中国支部”。在共产国际存在期间,中国共产党举行过六次代表大会,除“二大”外,每次都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参加。尤其是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从确定召开五大,到何时何地召开,参加人数、议事日程,再到大会纲领的起草、政治决议和组织决议原则的确定等等,无一不是共产国际的旨意”<sup>③</sup>。中共“六大”则被要求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的文件由共产国际执委会参与起草。从这层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不可能摆脱共产国际的影响。

共产国际的成立也标志着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开端。与第二国际时期相比,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工作实行严格的组织化和制度化。共产国际“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在妇女中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明确提出“既没有什么‘特殊的妇女的’问题,也没有什么特殊的妇女运动”<sup>④</sup>,共产主义妇女运动作为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在组织上要严格服从共产党的领导,目标上要同无产阶级革命的奋斗目标保持一致。中国共产党遵循这一原则,认为“只有共产党,只有无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的完全胜利,才能完全解放妇女”<sup>⑤</sup>。可见,在当时的共产主义者的信念中,中国的妇女

运动不仅仅是一国内部的事情,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一部分。而共产国际作为“一切无产阶级、一切被压迫的民族、一切被压迫的妇女及一切被压迫的少年的世界革命的总机关”<sup>⑥</sup>,中国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接受它的领导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 一、共产国际与马克思主义妇女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早在十月革命前,马克思的妇女解放理论已零星传入中国。1907年12月,《天义报》登载了震述的《经济革命与女子革命》,该文最后以附录形式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关于家庭和婚姻制度的论述。《天义报》的编辑发表案语如下:“马氏所主共产说,虽与无政府共产主义不同,而此所言则甚当。彼等之意以为资本私有制度消灭,则一切私娼之制自不复存,而此制之废,必俟经济革命以后,可谓探源之论矣。”<sup>⑦</sup>

1908年,《天义报》发表《女子问题研究》,提到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其推论家族之起源,援引历史,以为此等之制均由视妇女为财产。其中复有论财婚一介,约谓今之结婚均由金钱。……虽结婚由于男女间之契约,实则均由经济关系而生耳,无异雇主之于工人也。观于彼说,则女子欲求解放,必自经济革命始,彰彰明矣”<sup>⑧</sup>。

但是,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开始系统地被国人接受则是在十月革命之后,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这时,也只是这时,中国人从思想到生活,才出现了一个崭新时期。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而皆

准的普遍真理,中国的面目就起了变化了。”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尤其是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能够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离不开共产国际的努力。

为了加强对中国革命的指导,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先后开办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等学校,主要接受中国留学生,为中国革命培养人才。这些学校的课程设置中就有妇女运动的内容,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解放理论。中共先后选派了大量革命青年到这两个学校学习,其中包括向警予、杨子烈等妇女干部。

1920年,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书记处把很大精力放在了报刊宣传工作上。同年8月,在共产国际特派代表维经斯基的领导和帮助下,上海革命局成立,这是中国最早成立的共产主义组织,对中国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成立起着核心的作用,维经斯基是上海革命局的直接领导者。

上海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和宣传报道部,成为中国共产党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基地。1920年8月出版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共产党宣言》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全译本,也是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在中国出版的第一个单行本。宣传报道部成立了华俄通讯社,翻译和报道有关苏俄和共产国际的文章。上海革命局还先后创办了《共产党》、《劳动界》等共产主义刊物,《新青年》也被改为上海革命局的机关刊物。

随着《共产党宣言》以及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先后被翻译出版,李大钊、陈独秀、李达等先进知识分子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思考中国妇女受压迫的问题并探求中国妇女的解放道路。他们在《新青年》、《每周评论》、《民国日报》副刊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关于无产阶级妇女解放的文章,马克思主义妇女解放理论开始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

共产国际代表们努力的最显著的成果是列宁著作开始在中国出版与传播,列宁的妇女解放思想日益被中国知识分子接受。十月革命前,中国知识分子没有接触过列宁的思想,更不了解他的妇女解放理论。1920年11月,上海革命局创办了机关刊物《共产党》月刊,该刊着重宣传俄国共产党的经验和列宁的学说。1921年9月,上海正式成立了党的第一个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该社成立一年多的时间里,共出版《列宁全书》五种。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各地进步报刊发表了

不少列宁著作的译文,其中包括列宁论述妇女解放的《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论苏维埃共和国女工运动的任务》以及《国际劳动妇女节》等。

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妇女解放的理论为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工作提供了理论指导。1920年党的“二大”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在该决议中,中国共产党认为苏维埃俄国的妇女正享受着真正的解放“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妇女是得不到解放的。现在妇女在世界上开始得着解放地位的,就只有苏维埃俄罗斯……这便证明妇女解放要在社会主义的社会,才得完全实现。”因此,中国妇女的解放,必须要以苏维埃俄国为榜样,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才可能获得,“中国共产党认为妇女解放要伴随着劳动解放进行,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sup>⑥</sup>。

从此,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在理论上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组织上成为国际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 二、共产国际与中国妇女运动的机构设置和制度安排

为了实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以及妇女解放运动的有效领导,共产国际既有组织机构上的设置,也有相应的制度安排。

1920年7月,在俄共(布)中央妇女工作部的组织下,国际共产主义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会议根据列宁要求在国际内部设立妇女组织的指示,决定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下设妇女书记处。同年11月2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妇女书记处在莫斯科成立。1921年召开的共产国际“三大”通过了《共产党在妇女中进行工作的方法和方式》的决议,明确国际妇女书记处的任务首先是要“领导各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吸引各国妇女为世界范围内实现苏维埃政权和工人阶级专政而进行革命”<sup>⑦</sup>。国际妇女书记处在1924年改组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妇女部。

1922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根据国际妇女书记处的提议要求各国共产党:(1)把自己出版的妇女工作刊物送交给国际妇女处;(2)派一名中央委员负责妇女工作;(3)在党刊上开辟关于妇女运动的专栏;(4)与国际妇女书记处建立经常性联系;(5)党校要招收不低于学员人数10%的妇女学员,并且要开设妇女运动的课程。<sup>⑧</sup>

中共“二大”通过了加入第三国际的决议案，同时决定，党领导下的工会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和妇女组织分别加入第三国际领导下的赤色工会国际、共产主义少年国际和共产主义妇女国际<sup>⑨</sup>，由此建立起国际妇女书记处与中国妇女运动之间的领导与被领导关系。

随着欧洲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共产国际的工作重心逐渐开始向东方世界转移，东方国家的妇女运动渐渐成为共产国际关注的焦点。共产国际“三大”关于妇女工作的报告中增加了“关于经济落后国家（东方）中党的妇女工作”的内容。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要求国际妇女书记处设立专门负责东方各国工作的部门——东方妇女工作部，中国的妇女工作主要由该部门负责。

从1919年到1926年，共产国际曾召开过四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大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中国代表曾作过发言，向国际妇女部汇报中国妇女运动的状况。

鉴于共产党领导下的妇女运动同时也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中国的妇女运动实际上要接受国际妇女书记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双重领导。1923年，为了在中国、日本和朝鲜开展工作的需要，共产国际成立了由片山潜、马林、维经斯基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东方部远东局，其任务包括“监督这些国家的青年运动和妇女运动”<sup>⑩</sup>。

在中共召开“五大”时，共产国际妇女部曾作为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中共六大的决议草案实际上是由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参与起草，其中关于妇女运动的部分则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国际妇女部负责完成的。<sup>⑪</sup>1931年，共产国际妇女部曾给中共去信，对当年的“三八”妇女节的纪念活动提出要求和指导意见。总的来说，在实际工作中，对于中国妇女工作的具体指令更多的是直接来自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这符合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组织原则。

共产国际对中国妇女运动的了解与指导，主要是通过特派员制度。共产国际对各国共产党实行高度集中的领导，这种领导关系主要是通过向各国派遣国际代表来实现的。这些共产国际的特派代表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干预各国党的事务。先后派到中国的代表有维经斯基、马林、鲍罗廷等，其中也包括国际妇女书记处东方部派遣的妇女工作特派员。

从这些特派员发给国际执委会的报告中可以看到，他们对中国的女工运动十分关注，加仑的报告指出“在顺德，一个有3万女工的华南丝织工业

的巨大中心之一，竟连一个工会也没有。”<sup>⑫</sup>雷利斯基谈到上海“在纺织厂成立了由30名女工组成的妇女协会”<sup>⑬</sup>。无论是中国女工开展的罢工运动、工会发展女会员的情况还是中国共产党中的女党员比例，第三国际掌握的资料都相当翔实，这些成绩都离不开特派员们的努力。国际“三八”妇女节也是通过共产国际的驻华代表传入中国的。

### 三、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发展

在中国共产党的初创时期，由于斗争经验的不足，许多重大的政策与策略实际上是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的，中共领导下的妇女运动也离不开共产国际的指导。

#### 1. 共产国际对中共领导妇女工作的指导与推动

共产国际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妇女运动纳入了自己的工作日程。1919年共产国际“一大”召开时通过了《关于吸收女工参加社会主义斗争》的决议，指出“只有全体工人阶级不分男女紧密团结，共同斗争……才能彻底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因此，“为加入共产国际的各政党提出一项紧迫的任务，即必须全心全意吸收无产阶级妇女入党”<sup>⑭</sup>。但对于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而言，妇女问题显然还没有被放在议事日程之上，所以中共“一大”并没有涉及妇女运动的议题。

1922年7月，在中共“二大”召开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在给中共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中提出：“党的宣传还应该涉及妇女，应该从女工中间开始……必须把青年工人和大多数女工纳入工会组织的工作中去。”<sup>⑮</sup>共产国际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在中共“二大”得到了贯彻执行，“二大”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

1924年，共产国际“五大”在莫斯科召开，国际要求中共派代表四人到会，同时还强调“代表团中亦须有妇女和青年的代表”<sup>⑯</sup>。中共派了由李大钊、彭述之等四人组成的代表团参加大会，其中包括妇女代表刘清扬。她化名柳契卡，参加了妇女委员会。

随着中共领导下的苏维埃在各根据地建立起来，共产国际对苏维埃的妇女权益保障问题给予了特别关注。在共产国际东方部关于中国苏维埃问题的决议案中，要求中共在进行苏维埃选举时，“妇女得与男子有同样的选举权”；在关于中国农

民问题的决议案中,提出在贫民会里,“女子得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权利”,同时还要“组织青年男女农民学习班”以及“为农村女孩设缝纫班”等。<sup>21</sup>

在共产国际给中共的指示中,既有对中共妇女工作的肯定与鼓励,也不乏对其工作力度不够的批评与督促。共产国际驻华代表维经斯基在《关于中国共产党在1925—1927年革命中的错误问题》的报告中认为,中共“青年和妇女工作也很薄弱,这方面的客观条件很少去加以利用”<sup>22</sup>。因此,共产国际要求“党应更严重地注意妇女运动,要在这一方面加强党的工作,定出女工的特殊部分要求”<sup>23</sup>。

对于共产国际的批评,中国共产党作出了积极的回应“在中国革命运动中,青年与妇女占有重要的位置……妇女运动,尤其是纺织女工的一般的忽略,党应负相当的疏忽责任。”<sup>24</sup>随着中国共产党组织的日益壮大和成熟,对妇女工作的关注也逐渐增强。

## 2. 共产国际与中国妇女运动的组织建设

共产国际重视妇女组织的建设,在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建立一些从事妇女工作的专门机构是很合适的”,并要求“参加共产国际的各政党必须一律执行”。<sup>25</sup>同时举行的第二次国际共产主义妇女代表大会要求“第三国际各党必须在自己的各级党委会下面设立妇女工作部”<sup>26</sup>。

然而,对于刚成立不久的中国共产党来说,中央领导机构还比较单一,从党的“二大”到“三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尽管都提到“应设立妇女部”一事,但从“一大”到“三大”的中共中央机构设置中,都没有成立妇女部。

1924年上半年,国民党中央党部及国民党上海、北京、汉口等执行部先后设立妇女部。由于国共两党已实行革命统一战线,这一时期中共的妇女运动,主要是通过国民党妇女部进行。向警予曾担任过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妇青部助理一职(妇青部不设部长,只设助理,助理实际上履行的是部长职责)。中共四大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提出“应设妇女部”,但又强调要“秘密存在”,即女共产党员应加入国民党妇女部中工作,但组织上仍应受“本党指挥”,“施展本党妇女运动的计划”。<sup>27</sup>因此,尽管在“四大”上中共中央仍没有正式设立妇女部机构,但从1924年起,中共就已开始以“中国共产党妇女部”的名义发布妇女运动的报告或通告。

中共“五大”召开前,共产国际作出《关于中

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提出中共组织建设方面的十项“极其重要的具体任务”,其中再次强调党的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内应设立包括妇女工作部在内的几个基本部门。<sup>28</sup>

1925年5月,中共中央局进行机构调整,增选向警予为中央委员,同时开始设立妇女部和出版社。<sup>29</sup>1926年10月,妇女部更名为“妇女运动委员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时,“妇女运动委员会”成员达到31人。<sup>30</sup>

但是,与工会工作、农民问题、共青团建设相比较,妇女问题显然从来没有被共产国际置于议事日程中的凸显位置。共产国际经常就中国的共青团工作或工会问题发布专门性文件,并且多次给予经费上的支持,但却从来没有专门就中国的妇女问题给中共发过具体的指示。所有关于妇女工作的指令都是在有关中国革命的总体情况的汇报或指导文件里稍稍涉及,且往往是置于文件的末端。尽管如此,我们不能忽视共产国际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影响作用。由于妇女运动对于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从属关系,中国革命每一次因共产国际的指导和干预而发生的路线转折和政策调整,都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方向。

## 四、对共产国际对中国妇女运动的历史作用的评价

对于在共产国际帮助下建立起来的中国共产党而言,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意味着给人类解放开辟了崭新的道路,因此,要救中国,必须“跟着俄国的共产党一同试验新的生产方法不可”<sup>31</sup>。同时,处于成长初期的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理论还缺乏全面了解,实践斗争的经验也不够丰富,此时,来自共产国际的理论指导和工作扶持是合乎逻辑、无可非议的。应该承认,共产国际的指导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共产主义妇女运动的诞生和发展壮大;但是也应看到,由于脱离中国现实以及苏俄的大党、大国主义,共产国际的干预也给中国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带来了负面影响,甚至造成严重损失。

共产国际在远离中国的莫斯科,仅仅通过特派员们的汇报,显然不可能全面深入地了解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实际情况;对苏俄十月革命经验的高度自信,导致他们在指导中国革命时,不可避免地犯下教条主义和大党主义错误,尤其是共产国际“六大”确立的“左”倾路线给中国革命运动带来严重损失,也使中国妇女运动出现重大挫折。

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妇女运动决议案》实际上主要是由共产国际执委会责成国际妇女部负责起草的,是共产国际“左”倾路线的产物。该决议在总结中国大革命时期的妇女运动时,强调“首先要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的群众与女工群众”以及“党的妇女工作人员应无产阶级化”。<sup>①</sup>1929年,中共广西省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妇女运动草案大纲》,要求“党的妇运应群众化及无产阶级化,首先注意大城市无产阶级的女工群众”<sup>②</sup>。这显然是在贯彻共产国际“六大”要求“无产阶级化”的指示。

在强调无产阶级化的同时,共产国际还机械照搬苏俄十月革命的经验,强调城市是中国革命的中心,要求中共发动城市暴动来夺取政权。这种“左”倾主义路线也影响到了当时的妇女运动。1930年,中央通告第九十三号提出“为了要切实地执行三中全会的决议,就更要调动广大劳动妇女群众充实党准备武装暴动为苏维埃政权而斗争的伟大力量。”<sup>③</sup>同年,中共中央在给福建省委的信中,强调“目前妇女运动的主要路线”是“号召广大的劳苦妇女群众来参加政治同盟罢工,地方暴动,反军阀战争以至准备参加武装暴动”。<sup>④</sup>

机械照搬苏俄经验给中国革命和中国的妇女运动带来了巨大损失。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后,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结合中国实际,把妇女运动的重心从发动城市女工暴动转移到依靠根据地的农村劳动妇女。延安整风运动后,农村妇女的重要性被提高到了整个妇女工作的核心地位。随着毛泽东思想被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中国的妇女运动逐渐摆脱了共产国际的影响,走上中国化的发展道路。

总之,在中国妇女运动的发展史上,我们不应忽视共产国际曾起到的推动作用,但也要看到它对中国妇女运动所产生的消极影响。历史经验表明,只有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妇女解放之路。

注释:

①④⑦②⑤ [匈]库恩·贝拉《共产国际文件汇编(1919—1932)》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15页,第343页,第358页,第346页,第359页。

② [英]珍妮·德格拉斯《共产国际文件》第1卷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年版第205页。

③② 张静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史丛书》第2册万卷出版公司2007年版第132页,第253页。

⑤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264页。

⑥⑬⑭⑮⑯ 《中国共产党第二次至第六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6页,第25—26页,第118页,第312—313页。

⑧ 《共产国际大事记》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45页。

⑨ 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4页。

⑩⑫⑬⑭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435页,第632页,第312页,第582页。

⑪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97页。

⑬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0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17页。

⑭ 参见《天义报》1907年第十三、十四卷。

⑮ 志达《女子问题研究》,载于《天义报》1908年第16—19卷合刊。

⑰ 《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文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328页。

⑱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12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237—243页。

⑳㉑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6—1927)》(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第486页,第83页。

㉒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83页。

㉓ 《中央通告第三十七号——对国际二月八日训令的决议》,载于《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27—1931)》(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513页。

㉔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6页。

㉕ 陈独秀《对于时局之我见》,载于《新青年》第8期第1号。

㉖㉗㉘ 《中国妇女运动历史资料(1927—1937)》中国妇女出版社1991年版第41页,第70页,第69页。

[作者单位]中华女子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责任编辑:文工]